

K 835.127.5

0971

# 信 赖

——多勃雷宁回忆录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俄]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著  
ANATOLY DOBRYNIN

肖敏 王为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Copyright© 1995 by Anatoly Dobrynin

Published by 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根据时代出版公司 1995 年版译出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范建民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俄)多勃雷宁(Dobrynin, A.)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书名原文:In Confidence

ISBN 7-5012-0785-2

I . 信… II . 多… III . ①多勃雷宁—回忆录②美苏关系—史料 IV .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489 号

**图字:01-96-0836**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华茵排版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25.75 字数:659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致 谢

我要向所有将我引入外交领域的人表达深深的谢忱，是他们为我提供了绝好机会，使我得以在外交部门供职半个世纪，从而为我展现了外交和国际关系这一令人振奋的天地，而外交和国际关系正是本书的重点。我对苏联和俄罗斯外交部中各位同事的合作和友谊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和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术中心凯南研究所，它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我的朋友杜瓦尼·安德烈亚斯和唐纳德·肯德尔的支持和浓厚兴趣也有助于本书的问世。

我特别感谢作家兼记者劳伦斯·马尔金，他在整理资料、撰写手稿并使之最终成书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他的热情始终如初，并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批评意见，我十分感激他的帮助。在本书从构想到最终问世的过程中，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的指导意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不仅对本书的结构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还帮助使本书更具活力，更贴近读者。我还应感谢唐·奥伯多弗，他以专家的眼光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从而使我们双方都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伊琳娜·巴拉金娜，她不知疲倦地帮助我将本书译为英文。时代出版社的彼得·史密斯对本书做了出色的编辑，文卡·麦金太尔是本书的校对阅读员。所有这一切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一次愉快的经历，我对时代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威廉·海兰和罗伯特·列夫戈尔德，他们提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对我的文字进行润色的莫顿·詹克洛，他总是能提出明智的建议。

# 目 录

致 谢 序 言 .....	1
------------------	---

## 第一部 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 一 章 外交生涯的开端 .....	11
第 二 章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	25
第 三 章 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	38

## 第二部 在华盛顿

### 肯尼迪总统时期:1961—1963

第 四 章 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	55
第 五 章 古巴危机 .....	79
第 六 章 学会共同生存 .....	108

### 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

第 七 章 开始了解新总统 .....	130
第 八 章 莫斯科和越南 .....	145
第 九 章 试图混淆和平与战争 .....	161
第 十 章 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	177
第 十 一 章 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	192

### 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4

第 十 二 章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	219
第 十 三 章 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	240

第十四章	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260
第十五章	最高级会谈·····	275
第十六章	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306
第十七章	十月战争·····	332
第十八章	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349
<b>福特总统时期:1974—1977</b>		
第十九章	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368
第二十章	缓和受到侵蚀·····	393
第二十一章	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412
<b>卡特总统时期:1977—1981</b>		
第二十二章	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428
第二十三章	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461
第二十四章	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476
第二十五章	阿富汗·····	497
第二十六章	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520
<b>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b>		
第二十七章	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544
第二十八章	里根的讨伐运动·····	568
第二十九章	“多做少说”·····	588
第三十章	解冻·····	618
第三十一章	冷战结束的开端·····	639
第三十二章	告别华盛顿·····	672

### 第三部 离开华盛顿之后

第三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 总统·····	695
附录	·····	724
索引	·····	730
译后记	·····	812

# 序 言

3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了我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这就是冷战时期。我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工作经历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我刚从莫斯科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我的外交生涯，在苏联方面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在美国方面则是从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任内。总起来说，我和苏联外交的关系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而且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美国大使。我参与了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最高级会谈——从1955年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谈到1990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是唯一完全目睹了国际关系中这些重要事件的外交官。我从1962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一直到1986年才卸任。这是苏联乃至革命前俄国外交史上担任此项职务最长的任期。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项工作。

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关系始终极不稳定。两国关系通常在最高级会谈之后得到改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又趋于恶化。军备竞赛的速度远远快过旨在控制军备竞赛的裁军谈判。地区争端不断爆发。于是，使两国政府最高层人士保持秘密接触就成为我这个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的首要任务。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两国领导人展开恰当并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且尽可能维护两国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我竭尽全力地抑制

由于外交挫折、相互误解以及我曾亲眼目睹的大量政策上的失败所引发的冲动情绪。

在撰写本部书时，我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我在莫斯科查阅了苏联外交档案以及我本人的日记，这些材料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我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政治家、社会知名人士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正式会谈及私人会谈在本书中均有记载。此外，书中还叙述了我同莫斯科的上级及我国领导人的交往，包括我参加过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我在书中重点叙述了我个人参与过的事情。我还试图尽可能地说明我依据什么得出了对那些我不曾参加过的会议和讨论的看法。

我试图以一种我认为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苏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因为无论是白宫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都曾向我敞开过。本书除了回忆我早年在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以及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之外，还对从约翰·F.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等六位美国总统的情况作亲眼所见的第一手叙述。我曾多次会见过这几位总统。我也认识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布什总统。这些领导人的气质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大不相同。其中有几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在国内，我曾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仔细观察过他们，也观察了他们的每一位继任者，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1986年把我召回莫斯科，先是我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后来又担任他的美国问题顾问。后来我退休了。但是在1991年8月1日，我又重新回到苏联外交部——后来改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到1995年初写作这部书时，我仍在那里担任顾问。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给所有对苏美关系的复杂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告诫人们提防本世纪令人悲哀的错误再度发生。我还希望本书能成为一部描述白宫和克里姆

林宫如何处理国家事务的亲历记。

我的美国对话者们一直怀疑我是否真的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确，罗纳德·里根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曾经是）。事实上，我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外交官的身份，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利益，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共产主义哲学概念服务。我将苏维埃制度——包括它的缺点和成就——看作是 5 我国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直至今日，我对这一制度的伟大使命仍深信不疑。如果我在一生中有过什么重大追求的话，那就是使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受到尊重并且享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融合在国际大家庭之中。要实现这一追求，就必须考虑世界和本国的现实情况。

作为大使，我的日常工作是向政治局全面汇报情况，当然是直接向葛罗米柯汇报。我常常以他作为外交部长而不能采取的方式，代表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与美国的一大串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包括迪安·腊斯克、威廉·罗杰斯、亨利·基辛格、赛勒斯·万斯、埃德蒙得·马斯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亚历山大·黑格、乔治·舒尔茨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我们看到过很多争执的产生，也看到了它们得以解决，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紧张的谈判、要求和反要求以及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尽力保持良好的、事务性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有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想起我的大部分美国伙伴，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情。我也怀着喜爱和深深的感激之情回忆了我在使馆工作时的同事尤里·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乔治·马梅多夫、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维塔利·丘尔金、维克多·科姆普雷托夫、维克多·伊萨科夫——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驻外大使或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华盛顿与我们共同承担艰难工作的人。



我们大家一直在尽力使彼此间的联系渠道保持畅通，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两国关系的变化起伏而有所不同。苏美关系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危险状态演变为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倡导缓和时期的友好、福特和卡特执政时期的不稳定和混乱、入侵阿富汗之后和里根搞军备扩充时期的僵冷。尽管如此，我幸运地发现，在冷战时期我本人受到双方领导机构的欢迎，并且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在华盛顿，我可以接近上层人物。在他人看来，苏联大使享有这种特权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莫斯科，我们的政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动权利，尽管我必须说明我能够获得这种权利的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常常要求得到它，而且我的上司显然对我的做法感到满意。

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回忆向读者及我本人展示我的工作方式。从这种工作方式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人性和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事情的结局。外交毕竟不仅仅是一种公开的职业技能，它还是一种非常隐蔽并且富有个性的技能。

我相信我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打算与我交往，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乐意与我交往。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而且我公开表现出了这种愿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不论我们在政治  
6 上和哲学上有什么分歧——请相信这种分歧是很大的——我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看待。不过，我很想了解他们与我交往的动机，而且在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时，我决不会表现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意图的样子。

从职业标准衡量，我从未想过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尽管我总是尽力做到谨慎从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虽然它并不一定总是采纳我的意见。在一个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的世界中，我试图成为一名能够消除双方疑虑的人物。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感到纳闷，美国政府内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同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进行坦率的交

谈——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一般说来靠的是个性、相互尊重、职业作风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一点儿幽默感也是有帮助的。

我从一开始即决定打破葛罗米柯留下的惯例，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展不太拘泥于形式的关系。从斯大林时代起，会见外国人时要有一名见证人在场已成为一个传统，而我在拜访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时，却常常不带任何使馆人员。我认为单独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增加相互信任，有助于抛开往往是僵化了的官方立场去探求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希望避免同我的美国对话者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别是不要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以便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而营造一个较好的——不论是在两国关系稳定时还是在出现麻烦时——工作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总是试图在每位总统身边找到这样一名合适的人物，尽管不可能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罗伯特·肯尼迪与其兄长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与他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带来的总是总统表示不满的信息，仅此而已。于是，我试图找到一位像我一样热衷于通过相互妥协来解决那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棘手问题的人。这样，我们在必要时就可以分别向总统和政治局汇报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在这方面，肯尼迪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卢埃林·汤普森，特别是后来的基辛格和万斯做得比较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担任林登·约翰逊的国防部长期间曾经邀我到他家中共进午餐。我们先下象棋，然后才进行会谈，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坦率地讨论起裁军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有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想法。

我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还广泛结识了商人、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这一切都有助于克服冷战期间我们在使馆里体会到的孤立感。斯大林留下的沉重遗产使驻其他国家使馆的外交部同事们不大敢这么开放。我还参加华

盛顿的社交活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由于有长期供职的经历，我最终成为外交使团的团长。

但是，善于交际在我的大使生涯中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同莫斯科的政治机关，首先是政治局以及共产党总书记（我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主管政治和军事情报机关的官员；我当然也知道我国外交部就苏美关系正在讨论着的问题。我可以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坦率的交谈。

我与之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那些华盛顿官员懂得，他们告诉我的事情将通过恰当的渠道送往克里姆林宫。他们告诉我的并不是国家机密，而是基本的政治情况、个人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反过来，我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令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只是提问题，而不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作为回报，那人家就不会再次邀请你了。

所以，我准备向他们透露一些将会令国务卿、国防部长或副总统感兴趣的我国的情况，这样他们就想再次会见我。我也因此可以自由地——尽管有一定的限度——探寻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可能被带到正式的谈判中并且对双方都有帮助。在和基辛格打交道时，我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莫斯科从未有人告诫我收敛言行，与美国人保持距离——我所认识的克格勃历任首脑都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没有这样做。通过我充满诚意的会谈，他们得到了来自华盛顿最高层领导人的信息。我同美国人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很少有的，因此也就无法从那里得到类似的信息。几乎没有几位苏联大使准备冒险去做超出交换官方情报范围的事情。虽然我也有些谨小慎微，但我知道我在国内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除此之外，我不是政治家，不打算在莫斯科取代任何人的位置。我对做一名大使相当满意。我的上级知道这一点。

8 我认为，作为大使，我的行为也合美国人的意。同我交谈的美

国官员们常常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给苏联领导层。他们知道，每当我回莫斯科休假时，我不会只去克里米亚半岛，而是要在莫斯科停留，与政治局委员以及克里姆林宫其他高级官员谈话。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每当他想通过我传递某些紧急信息时，我准在莫斯科。他非常清楚，我频繁地回国参加磋商，参加党的会议或者休假有助于替他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可以坦率地、相互间完全信任地探索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些纠纷的途径，而且我们总是力求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纠纷。

我尽力使华盛顿明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政府通过我提出某项建议，那怕是非正式的建议，我肯定会将它报告上去，而且我有办法让外交部和负责决策的政治局获悉这一建议。我当然不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将被采纳，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了某项建议，而且我们在华盛顿已经事先研究过这项建议，那么我至少可以有机会将它提交给莫斯科的高层领导，并且会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复。即使这种答复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通常会为我们继续进行对话留有余地。

这一切都是我们最终称之为秘密渠道这一重要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冷战时期发生的争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今天，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仍然未被如实地详细披露出来。如果我同总统、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会谈时有他人陪同，那么交换情报、为谈判打基础以及事实上是替两国政府讨价还价等工作就很难做了。

当着基辛格手下人的面，我不能说——我确实对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得了，亨利，这是讹诈，是胡扯。你打算干什么？”当着我的人的面，他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强硬的话，而且也不会议论我的上级。很久之后，我发现在我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会谈时，他的一帮助手总是坐在一旁。我纳闷为什么我们两人不能单独会谈呢？过了不久我就明白了，在他任

职初期，他无权同我一道探求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新思想，因为总统当时对这种做法不感兴趣，其表现就是舒尔茨不愿单独和我进行秘密会谈。在里根第二届任职期间，我和舒尔茨合作得非常好。

我还知道，我接近华盛顿的上层人物使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们很恼火，因为很多非常重要的交易都是越过他们进行的。作为外交官，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葛罗米柯根本不会透露那种可能为双方坦诚交换意见奠定基础的信息。而美国大使又能告诉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哪些可能会令他感兴趣的美国情报呢？所以，大使们只能递交来自华盛顿的照会，并且当着双方在场的担任翻译、记录和观察会谈情况的众多官员的面，解释照会的内容。由于克里姆林宫有着极强的保密观念，由于我们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形式主义，想在莫斯科通过秘密交谈来交换内部政治情报是根本办不到的。

苏美关系的性质是很奇特的：它们是对手，因为它们竞相宣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们又是伙伴，因为它们对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生灵的命运共同负有责任——它们中的任何一方一按电钮便能够毁掉这个星球。回首往事，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担任驻华盛顿大使的 1/4 世纪中，苏美关系大多处在对立甚至敌视的复杂状态中。如果当时能为我们两国之间打下一个相互信任的牢固基础的话，那么双方可以为两国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做多少事，并且还将可以做多少事啊！

虽然我们不能用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评判过去，但过去留下的教训却应该记住。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十年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和平，对世界文明的存在形成威胁——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形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形势。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混乱和危险应该被看作是双方正在为冷战而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

## 第一章

13

# 外交生涯的开端

###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我是在25岁那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很意外地成为外交官的。194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我担任工程师的那家飞机制造厂，我的一生因此而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我转天到它的总部去。以前我从未去过这么高级的权力机关，为此我一整天都在琢磨：为什么要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到那儿去。到了那里之后，我被直接带到了人事处。

一位面无表情、仪表堂堂的人板着面孔接见了，他很容易给我这样当时还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姓“斯托博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人事指导员。显然他无意与我长谈，甚至不想就这件事情本身说些什么。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一个意见，要送你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

我应该说明，俄语中“有一个意见”——从不明确是谁的意见——这一措词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词汇中一直是很常见的。它涉及到秘密和权力：你不知道该向谁提出申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意。

这项建议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领导的115飞机试验厂当设计师。苏联空军的战斗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雅克夫列夫

设计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从未想过做一名外交官或者其他任何工作。

14 斯托博诺夫注意到我一点儿也没有为得知这一消息而激动，甚至还试图提出异议，于是他厉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党更知道哪里需要和如何使用它的人民。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不过，今天你还可以考虑考虑。明天早晨我等着你的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我担忧的事情是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不论在苏共党内还是在政府中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挑选我做外交官？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我回家开家庭会议讨论这件事。当时，我的妻子伊琳娜——她也是一名航空设计师——即将大学毕业，由于连年的战争，她读书的那所学院已经搬到远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去了。

于是我父亲成了我唯一的顾问。他是一个管子工。我母亲基本上是个文盲。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同时也在首都上演最好戏剧的莫斯科大剧院做领座员。我不仅通过她观看了在那所剧院上演过的所有俄罗斯戏剧，而且凭着一张证明我是她儿子和一名穷学生的便条，我可以进莫斯科所有的剧院。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一位数学家，我自己也爱好数学并获得过莫斯科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它使我在1937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但是我父亲极力主张我进莫斯科航空学院。“噢，得啦，”他说，“上综合大学你只能坐在那儿读书，但是上了航空学院，你就能从事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工作。”

因此，我父亲总是梦想他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认为让我当外交官是胡闹，因而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意见。他那一阶层的人认为外交官混迹于上层社会，不是窃贼就是骗子。他无法想象他的儿子会一辈子去干这一行。我读的书自然比父亲多一些，但是对外交官到底干些什么，我自己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事情是明摆着的：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此不打算换工作。总之，当天晚上我已下决心拒绝接受这个奇怪的建议。

我第二天的答复使斯托博诺夫大为恼怒。他说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认识到被送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是多么大的荣耀，假如我不能理解他善意的劝告，那么我应该把这个建议视为战时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于是，我转而向我的上司——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总设计师（他有陆军中将军衔）——讨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他喜欢我，并且关注着我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他对情况发生变化表示遗憾，并表示他曾希望看到我在8年或10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说拒绝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我就这样离开了工厂，离开了飞机设计工作。我从未放弃过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即使在我当上外交官以后，我仍然密切注意着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在航空学院学习的岁月最终没有白白浪费掉。苏美裁军谈判涉及到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和导弹，而我所掌握的工程技术知识对我的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掌握这一相当复杂的技术领域中的问题比那些未受过技术教育的纯粹外交官同事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我认为我受到的技术训练也有助于我形成重实际、轻意识形态的倾向，这是我研究外交问题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特点。

在很多年中我一直在想，当初是谁的“意见”使我的一生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我已担任驻美大使后，一个偶然的会使我解开了这个谜。在约索沃——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很多高级别墅建在那里——度假的时候，我外出散步，很意外地碰见了曾经很有权势的前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自从1957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撤了他的职之后，他就一直住在约索沃。我们会面时莫洛托夫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极佳。他依然信服他加入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极不赞成任何调整或其他改革；直到生命结束时，他一直在斥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赞扬斯大林。

15



在谈话过程中，我回忆起1944年我“应征”进入高等外交学校（后来更名为外交学院）的事。我再次对尽管不认得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却被选中从事外交工作表示困惑不解。莫洛托夫仍然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在1944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苏联红军在前线发动的成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话题，谈起培养新的外交干部的必要性，因为希特勒很快将会被打败，苏联外交必须为迅速恢复外交活动作好准备。苏联将与很多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战后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简单地说，苏联很快就需要组建大批的并且是完全合格的外交使团。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但斯大林仍要求莫洛托夫立即成立外交学校。

16 “可是我们从哪儿才能招到学生，”莫洛托夫问斯大林，“特别是那些学过大学文科和语言课程的学生呢？”斯大林回答说，没必要非从受到文科教育的人中招收学生不可，以后还可以学习那些课程。现在，他说，外交部可以从军工厂挑选年轻的工程师。他说一定要挑选那些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的工程师：“工程师和工人一样，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只能得到700克的黑面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住在工厂里，很长时间见不到家人。”斯大林解释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能够解决艰苦岁月中难免出现的日常工作中的难题和冲突，而且工人们仍旧尊敬他，那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外交官，或者至少具有成为一名外交官所必须的能力。

的确，我们第一个班将近50名学生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航空工业部门。战前，航空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名望的院校，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想进入这所大学。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被“斯大林招入”外交界的情况，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此外，斯大林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尽管在战争即将爆发前老一代外交官已经受到清洗，但他仍下决心不让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恢复。即使像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前孟什维克，由于他在西方国家中交际甚广又享有声望，因此在与美国和英国结成战时同盟